

■新作聚焦

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宿命

□徐勇

刘庆邦的小说经常触及现代转型中的乡土社会的困境及其宿命。

房国春虽然代表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可贵的方面,但他既不了解中国的复杂现实(乡村现实),也缺乏反思反省的能力,小说以他的悲剧性命运的书写,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当前现实语境并安置自身的问题,而这正是摆在当今知识分子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刘庆邦的小说聚焦乡土农村的现实生活,但其思考的方向并非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下的现代乡土社会的结构变迁(《到城里去》),也不是历史和现实纠缠下的农村苦难(《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更非原乡想象中静美的乡土景观(《遍地白花》《梅妞放羊》)。《黄泥地》思考的是现代转型中的乡土社会的困境及其宿命,所谓“黄泥地”,即这种困境的象征。

权利的核心在其自身

小说从房国春村的政权更迭起笔,村里的换届选举,老支书房守本的儿子房光民成功上位,这一父权子替现象引起了村民们的普遍不满,因而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倒阁”运动。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描写乡村权力斗争的小说,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重写现实的意味很浓。确实,“倒阁”成功后房光民治下的乡土农村与之前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反而更无约束、肆无忌惮。从结果反观村民们当初所展开的“倒阁”运动,其实是合法性不足的。

这当然不是说村民们当初的“倒阁”就不合理。就权力的父子相替而言,这一现象本身有其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其封建主义的阴影难免让人浮想联翩。而事实上,村民们当初反抗房光民房守本父权子替的背后,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所指。房守本治下的农村处于特定历史与现实的交接,“文革”的阴影及其专制主义的噩梦,是村民们萦绕不去的幽灵。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遗留赋予了村民们的反抗以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们反抗房守本的儿子房光民接替村支书这一行为,折射出他们走出历史阴影的渴望和努力。但问题是,他们反抗既没有彰显其精神肉体上的双重创伤,也没有明确的主张。只是为反抗而反抗,其

结果就变成了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变化的只是当权者的个人,权力的本质及其功能并没有任何变化,而民意——村民的意志——也仅成为权力斗争的武器,并无实质的意义。

就这部小说而言,民意虽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但既不能无限夸大,也不能没有限制。任何以民意之名而并不为民谋利的行为,其实都是对民意的滥用。《黄泥地》的写作正是在这一方向展开了对民意的深刻反思。刘庆邦通过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民意一旦同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其危害性往往会更大也更具迷惑性。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能对权力的本质进行反思,所谓父权子替与民主选举,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可见,权力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真正选举,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等形式,而在于其本身。房国春村村民鼓动同乡中学教师房国春挑头倒阁,房国春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但他意识到这点,所以他失败了,并且失败的很惨。相比刘震云式的隐喻书,刘庆邦显然别有怀抱,他既无意于解构或嘲讽,也并非仅仅在反思现实和历史。

现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精神

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房国春的抗争之路。他先是被村民哄抬出来挑战村支书一家,而后演变成自己的诉求上访,又被别上的上访户鼓动,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不断的上访和抗争中度过的。从历史的渊源来看,上访现象中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带有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历史痕迹,反映的是民众对公平世界的一种愿望:寄希望于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或上天听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公正现象。小说中房国春的上访就带有这样的想象。但最终问题的解决却必须依靠低一级的权力机构(如县乡政府)。房国春看不到这点,他的失败不可避免。另外,房国春的悲剧性处境还在于,他的反抗和上访这一“能指”缺乏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所指”,其对象不断变化,“上告的对象越来越多,告状的雪球越滚越大。同时,他从反面获得了继续上访的新的动力,下面的官僚们这么不讲理,不上访真不行啊,不上访真的对不起党啊!”至此,他的上访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现实诉求或利益,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姿态和仪式。这与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贾平凹《带灯》等小说中主人公的上访截然不同,而带有一种“后寓言写作”的倾向。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房国春身上存在着古代士大夫的思想。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国家权力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济天下的思想是内在于他们群体存在的抽象,其天下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天下并非天下人的天下,而只是儒家构想中的天下。房国春则不同。他作为一名教师,是现代社会分工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就现代性的社会分工而言,人们往往只能各司其职,各务其本。他的悲剧正在于时代的错位及其身份认同的混乱。他以古代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加之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庞大而严密的技术社会,其悲剧不可避免。但问题是,房国春为什么这样固执?显然,他的固执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传统在起作用: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自命不

■短评

■新作快评

杜文娟短篇小说《红柳》
《光明日报》2015年1月16日

杜文娟的短篇小说《红柳》讲述的是雪域高原的故事,主角不是这片神性大地上的藏族人、虔诚膜拜的朝圣者或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而是那些平凡的雪域新兵,他们肩负使命,同时也渴望着从容的日常生活,尽管这生活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杜文娟笔下的新兵可爱而真实。杜文娟喜欢人的气息和人性的色彩,她善于镌刻人在追求自身正常利益中所展现出来的趋利避害的天性,甚至长于也乐于展示人的“私欲”,这样的“私欲”会让读者咀嚼出人性的复杂、绵密和绚丽多彩来。雪山在杜文娟的作品中不是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量的滥觞之地,它仅仅是一种背景,一种叙述的张力表达,一种人与雪山,新兵与绿色希望的叙述景深纵向剖析的“高地”。

《红柳》中的绿色生命意象是整部作品的支撑和核心。李秦川是关中大地农耕文明的缩影,安土重迁、务实操守的禀赋给予他博大、厚重的性格底色。少年李秦川成长在秦岭的怀抱中,因而生发出对高山的情感,因此,新兵们对雪山的恐惧在李秦川身上是不存在的,他看到远处的雪山“有几几分似秦岭”便“相看两不厌”。

小说似乎不意在表现存在的艰难和生命在雪山下的异常脆弱,尽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与死这一人类不得不直面的最大母题面前,杜文娟毅然将目光投向了生的光明和美丽。新兵博士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他学识渊博,但尖锐刻薄,在与雪山零距离接触后很快败下阵来。其实,博士几次三番拽住李秦川的细节描写,也是作家某种思想的流露。以博士为代表的都市文明是不被雪域接受的,惟有意志和心智的能量才能得到这方净土的接纳和亲近。新兵博士只是雪山的匆匆过客,是雪山中影子般的人物,来去无踪。老兵形象则被杜文娟赋予了更多的深层内涵。尤其是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红柳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生命绿色的维护和守望。这一生死体验使李秦川明白了绿色之于雪山的不可或缺性,这样的不可或缺无异于造物主和上帝的眷顾,让雪域高原的生命得以延续和繁衍。

绿色生命的再生同样是写实主义的。在这点上,杜文娟的西藏题材作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类作品并没有虚构和挖掘超自然的力量和那种略带魔幻、神秘的宗教色彩的主题,而是着力呈现现实和当下的西藏,那种人文的西藏、属于作家自我独特生命体验的西藏。蔬菜温棚是这部小说的意趣所在,是小说的象征,也是小说希望的凝结。老兵的红柳也被种植在温棚里了,它渐渐长大,和遍地的蔬菜一样,成为了雪域高原的生命家园,抚慰每一位西藏的到来者。此刻的绿色蔬菜和雪域新兵的绿色军服渐渐融在了一起……

茫茫雪山一望无垠。这片“生命禁区”被植入了绿色,这样的绿色看似脆弱和渺小,但是,这是与生命的一次赌注,和生命的一种约定。杜文娟把绿色的蓬勃生命意志放在了雪山中,放在了每一位驻足于西藏的人心中,故此,这样的绿色,就有了诗性和生命昂扬与不息的哲学意味。

老兵是一位如夸父般的人物,其愚公移山式的捍卫绿色生命的行为可歌可泣。李秦川是一位接力绿色生命的使者,他风华正茂,他有未来的人生规划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雪域高原的那一抹新绿,彻底改写了他人的人生轨迹,让他变为高原的建设者和灵肉的皈依者。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服役期满的他想继续留在高原,和绿色相伴。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如愿以偿地留在了高原,只有那一抹红柳长势喜人,将希望无声地传递着。

雪山中的生命约定

□文剑

“80后”文学研究的新高度

□白烨

立,尤其是市场文化的全面建立等等都是其崛起的重要背景。文学与文化场域上出现的这些新兴力量与新型关系,都以不同的方式释放着能量,施加着影响,使得当下的文学与文化,更加复杂繁复了,而这正给不重传统、不守成规的“80后”们提供了天赐良机与绝佳舞台,使得他们有了可以尽情施展自己才情的新的可能。

《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对于“80后”与网络传媒、网络文化的关系的探悉是细致入微的,不仅把握全面,解读深入,而且有关“代际权利与社会权力”、“世代的文化气质与时代的文化症候”、“大众狂欢式的传媒与‘粉丝’现象”等问题的论述,也在相互关联的问题上沿坡讨源,探赜索隐,在客观肯綮中别具新意与深意。这些有识有见的看法,在揭悉“80后”现象隐含的种种社会密码的同时,也深入解读了“80后”所置身的这个独特的文化时代。

同时,该作对于“80后”文学现象自身的审视与阐释,从主体到客体、从文学到文化、从内涵到外延,层层递进,擘肌分理。可以说,“80后”是以文学方式显示出来的文化现象,也是以代际形式体现出

如何呈现批评的诗意与思想

——读刘波《当代诗坛“刀锋”透视》 □张颖

歌研究的重要方向。诗歌批评应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无限接近诗人的创作原意,对其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公允的判定。刘波的为文观念深入浅出:以专业的方式进入,以公共的方式出来,这无疑增加了诗歌批评的“亲和力”。作者将他的学术理想用感化人心的语言灌注在写作中,无论是阐释者还是被阐释者,都达到了一种生命的敞开状态。同时将个性与共性融合,既把握诗歌自身所具有的“介入”美学,又不失掉诗人那份独特的诗性体验。

虽然当下诗坛的现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有些诗人总是在默默地引领着诗歌的潮流,探索无限的可能。我们从作者在不同时期所选取的诗人身上,看到了诗歌的历史与延续。他们的经验或许还不成熟,他们的作品或许还不是经典,但他们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作者以谨慎的学理态度进

来的社会现象。因此,对于他们的认识与理解,不从文学入手不行,仅限于文学也不行,这就需要运用综合性手段,多角度切入,多层次解读。文化视野与综合手段,正好是江冰的长项所在。“80后”是如何之独特,如何之复杂,如何之“混血”,这本论著可谓作了入木三分的剖解,得出了最为令人信服

此外,该著述在新媒体、新人类和新文学的理论框架下,从媒体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多种理论视角,以点带面地考察“80后”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富有的诸多内含和延伸意义,可以说,这是一部以论带史的“80后”文学史,在如何看取和评说“80后”文学上,以出自作者深思熟虑的意见,与“80后”们构成了一种文学对话与学术交流。而这样一点,也是极具深长意义的。

“80后”文学仍在行进着、发展着,其不断演变的走势,日益分化的倾向,不断给当下的文学研究提出新的挑战,也提出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80后”文学与文化的跟踪与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研究正未有穷期。

■创作谈

林斤澜老师跟我讲过,他和汪曾祺曾登门去看望沈从文,请教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好。沈从文的回答是:贴着人物写。他们觉得沈从文的回答有些简单,不能让他们满足。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再次去找沈从文,希望沈从文能多讲一些。沈从文主要讲的还是那句话:贴着人物写。

林斤澜老师跟我讲这些往事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来想去,似乎明白一点了,他是他以特有的方式在教我如何写小说。小说的作法多种多样,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写人,写人的感情,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而要把人物写好,一个贴字耐人寻味,颇有讲究。这要求我们对笔下的人物要有充分的理解、足够的尊重,起码不是拽着人物写,不是推着人物写,不是逼着人物写,更不是钻进人物的肚子里,对人物构成威胁和控制,对人物进行任意摆布。

要把人物写好,我们脑子里须装有很多人,以供我们挑选。好比我们要酿酒,手里得有粮食才行。如果粮食不够,一味掺假使水,再兑点酒精,造出来的只能是假酒。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脑子里储存的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写起来就会捉襟见肘。有人说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是多个人物集合起来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个人的体会,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有生活中的原型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原型作为支撑,人物就很难立起来。

所谓贴着人物写,我理解,不是贴着人物的身体写,而是贴着人物的心灵写。任何文学作品,构建的都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心灵世界。我们得到了创作材料,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材料进行心灵化处理,一一打上心灵的烙印。如果没有心灵的参与,没有进入内心世界,材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原始的材料,不会升华为艺术。沈从文先生也说过,“一切优秀作品的创作,离不开手与心。”“无非都是‘写人,写事,写心’,‘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

那么,我们拿什么去贴近人物的心灵呢?当然是将心比心,以作者自己的心灵贴近作品中人物的心灵。我们写小说,其实是在写自己。小说中有一百个人物,就有一百个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自己和不断打开自己心灵的过程。我们只有做到和作品中的人物贴心,才有可能赢得信任,所有人物才会对你敞开心扉,我们所写人物的一言一行,才会合情合理,经得起挑剔。

有一点需要小心的是,我们不可自以为是,不可完全以自己的心理取代人物的心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其中包括日常生活的逻辑,还有文化心理的逻辑,逻辑是很强大的,差不多像是铁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受到的逻辑的支配和制约。薛宝钗和林黛玉的逻辑大相径庭,如果让林黛玉与贾宝玉谈仕途经济,那就可笑了。

贴近人物的心灵

□刘庆邦